

編者的話

自中國內地改革開放以來，道教獲得了發展的黃金時期。三十多年來，依靠各地信眾的艱苦努力，道教取得了長足的發展進步。如何總結過去的成績，並規劃未來的發展，乃是當今道教界亟需進行的工作。今年三月，本刊主編曾應邀赴京，參加中國道教協會與國家宗教事務局聯合舉辦的「鞏固國際道教論壇成果，推動道教文化發展」座談會，其議題即關乎此事，足見有關方面已高度重視這個問題。本期「特稿」欄目發表的陳耀庭教授〈鞏固道教恢復成果，抓住道教發展時機——我對近年來中國大陸道教發生的變化的幾點看法〉一文，內容也是圍繞上述問題。這篇文章，一方面總結了「改革開放」以來道教取得的十個方面的成就，另一方面則對道教在偉大「中國夢」裏的定位及其近期的發展任務進行了說明，實可為有關方面提供重要參考。作為當代道教正一派領袖陳蓮笙道長的長公子，以及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的前所長，陳耀庭先生可謂是身兼教界、學界兩個領域重要角色的人物，是故此文之情也真切、意也深遠，頗值得我們關注。

「道教經典」欄目中的文章，一為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前主任、中國社會科學院特聘研究員董京泉先生的〈對《道德經》王弼本若干字句的校勘及詮釋〉，一為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張魯君女士的〈《上清洞真九宮紫房圖》辨疑〉，前者博引各家看法，對《道德經》王弼本的諸多文句進行了新的校勘和詮釋，後者細考圖文本身，對法國學者施舟人(Kristofer Schipper)主編《道藏通考》(*The Daoist Canon: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*)的相關部份提出了批評。兩篇文章的篇幅雖各有長短，卻皆體現出了頗高的學術水平。這類高水平的學術論文，也是《弘道》尤為歡迎的！我們希望，《弘道》所弘揚的，不僅是道教文化本身，而且是學術研究精神。既然是學術研究，就應該恪守規範，但我們最近卻發現，有作者觸犯「一稿多投」之戒，其行為實在令人遺憾！

本期值得一讀的文章還有不少，如「道教歷史」欄目中丁強撰〈北朝道教管理制度——以寇謙之《老君音誦誡經》為中心的考察〉一文，圍繞北魏寇謙之改革天師道一事，對北朝道教之道官任免、廚會規矩、奉經態度以及受籙、修行、上章、求願、送亡、救治乃至對「違法」的處理等諸多問題，進行了細緻的討論。這種對於道教本身之問題的細緻探討，顯然有別於某些論著大談道教與統治者之關係的做法，無疑將深化我們對於早期道教的認識。事實上，學界有關早期道教歷史的認識還有很多不足，如十一月在上海舉行的「正一道教研究」國際學術會議曾有許多學者指出了這一點，會議發起人之一劉仲宇先生甚至感慨：某些專門研究道教歷史的著作雖然「洋洋數百萬言」，但對於作為早期道教組織重要制度的「入道授籙」一事竟然「完全闕如」，實在令人「非常遺憾」！（劉仲宇：〈從盟威到授籙——早期道教入道方式的探索〉，載《正一道教研究》第一輯）由此，也可見道教研究之任重道遠。

丁強